

论晚清思想界的先觉与清政府政治决策的滞后性

李克玉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系, 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往往是对时代敏感的思想界先于政府觉察到。所以,开明的政府都非常注意观察和了解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思想界的动向,然后依据思想界先觉们的理论和主张,制定针对时局的政治决策,与时俱进。晚清时期的清政府则不然,往往是对思想界先觉们的主张和要求置若罔闻,滞后于形势多少年以后,为形势所迫,才不得不作出落后于形势很多年的政治决策。晚清政府之所以积贫积弱,一再落后挨打,最终走向灭亡,就是因为它政治决策总是落后于时代,不能与时俱进。

关键词:晚清;思想界;先觉;清政府;滞后性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600(2006)03-0065-03

往往是对政治敏感的思想界先于政府觉察到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所以,开明的政府都非常注意观察和了解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思想界的动向,然后,依据思想界先觉者的理论和主张,制定针对时局的正确决策。而反动的政府,则往往压制思想界的自由,不让思想界有什么建树、先知和预见,或者是对先进思想界的主张和要求置若罔闻,顽固地幻想着照老样子继续统治下去。晚清时期的清政府,就是这样一个无视思想界的先觉者们的正确主张和要求,不能与时俱进,决策总是滞后于时代的政府。这是清朝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

清王朝的统治,从19世纪已经进入到了日益衰败的晚期。这时的清王朝,社会上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思想领域万马齐喑,毫无生气。多数士人或醉心科举,沉湎于制艺,或兼商兼吏,钻营竞本,于国计民生,漠不关心。时人张穆把当时的社会比成五官犹存而官窍不灵的垂危病人,以警告世人。他指出:“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官窍不灵。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此。”^{[1](P85)} 龚自珍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垄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2](P6)} 人才枯竭,是当时社会衰败的主要征候。龚自珍在他《尊隐》一文里,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宣布了革命危机的到来。他说:“日有三时,一曰蚤(早)时,二曰午时,三曰昏时。”而清朝已到昏时。在昏暗的世界里,“灯烛无光,不闻馀言,但闻鼙声。夜之漫漫,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3](P507)}。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社

会背景下,产生了晚清第一批具有政治敏感嗅觉的思想界先觉者,主要是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贺长龄、张穆、姚莹、包世臣等为代表的经世派,他们早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觉察到当时社会的严重危机,一方面揭露和批判社会的弊端,一方面大声疾呼“更法”和改革,来救时匡弊。龚自珍就曾发出呐喊:“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增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2](P6)} 魏源更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4](P48)} 这就是提倡推行一系列“实政”、“实学”,企求匡世济民的实际行动。所谓的“实政”、“实学”,是指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实际政务和学问,诸如漕运、盐政、农事、河工、兵制、刑律、吏治、科举及边疆史地等,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他们这些建议和呼声,本应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采纳,而清朝统治者根本不以为意,依然文恬武嬉,歌舞升平,做他们的“天朝上国”美梦。

鸦片战争的炮火,对整个中国来说无异是一场惊雷,尤其是对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思想界先觉者们,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奇耻大辱。经世派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立足现实,开眼看世界,探索救国御侮的途径。林则徐不仅主张坚决抵抗外来侵略,而且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早在广东禁烟期间,他就摆脱了封建士大夫盲目虚骄的心理,为了解“夷情”,“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5](P111)} 并亲自主持编译了《四洲志》。他还注意学习西方的船炮技术,购买西方炮舰,组织人力摘译有关船炮操作的资料,开创了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魏源在鸦片战争期间曾参加过浙东

收稿日期:2006-01-16

作者简介:李克玉(1955-),男,河南柘城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抗英,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痛心疾首,愤而著《海国图志》50卷(后扩充为100卷)。该书不仅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风俗、政情,而且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他认为,要强国御侮,必须从“悉夷情始”,了解世界,承认西方国家有值得中国学习的“长技”。他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并建议在广东设立造船厂、火器局各一个,聘请法、美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练精锐水师3万人,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这样,在造船造炮技术和作战训练方面,“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6](P17)}。这支新式海军,战时可以抵抗侵略,平时可以在沿海查禁鸦片走私、护送漕运、递送文书、护送民间出洋贸易的商船等。造船厂、火器局除修造军用船炮外,也可以造民用商船、望远镜、蒸汽磨、弹簧秤、风火锯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与此造之”^{[6](P11)}。此外,在上海、宁波、福州、天津等地沿海商民,听任他们自由集资设厂,制造轮船或机械,作为商品出售,并允许到海外贸易的商民从国外购买船炮转卖给政府。可见魏源所设想的,不仅要发展新式的军事工业,而且还要发展民用工业,明显具有发展资本主义倾向。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以上这些做法和主张,代表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界先觉们要求改革社会、“制夷御侮”和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与呼声,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可是,清朝统治者对思想界先觉们的主张与呼声,却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当林则徐被革职后,曾向道光皇帝上奏折,建议用粤海关收入的十分之一制造船炮,加强国防力量。这本是明达笃实之论,而“道光皇帝却朱批:‘一派胡言。’顽固地拒绝接受”^{[7](P122)}。有些封建顽固派甚至攻击西方的先进技术是“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8]。这说明鸦片战争的炮声和思想界先觉们的呼声,并没有惊醒清朝统治者和清朝政府,他们依然故我,继续做他们的“天朝上国”的美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和整个地主阶级统治阶层,他们普遍痛感此役“创巨痛深”,因而,“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9](P26)}这时清政府才想起林则徐、魏源“师夷制夷”的主张,并按着林、魏的思路,仿造起洋枪洋炮来,掀起了轰动一时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虽然掀起了,但比着林、魏等先觉们的思想主张,已经滞后20年之久了。

晚清第二批思想界的先觉者,是以王韬、马建忠、薛富成、郑观应、陈虬、汤震、胡礼垣、何启等人为代表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大体形成于19世纪70~80年代,基本上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而出现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有不少人曾是帮着洋务派搞洋务的人。他们有的到过国外,有的甚至长期住在海外,眼界较为开阔,他们在对中外社会比较研究中,发现洋务派视为身家性命的洋务运动,只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不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没有学习到

西方的“根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因而,他们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著述中所反映的思想主张和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步步逼进,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此忧心忡忡。马建忠指出:“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陵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10](P20)}此外,他们还尖锐抨击外国侵略分子(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外国传教士的横行霸道,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

第二,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维新思想家有着强烈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愿望和要求。他们一方面尖锐抨击清政府“苛商”、“病商”政策,以及洋务派“名为保商实剥商”的做法,为提高“商”的地位大声疾呼;另一方面提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办法和措施,以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厘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此深恶痛绝。王韬指出:“数十里之地,关卡林立,厘厂税厂征榷烦苛,商民交病,行旅怨咨。”^{[11](P44)}他们要求把厘金合并于关税,一次抽足,减少税卡,以苏商民之困。对洋务企业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作了反思,揭露其中的种种弊病,称之为“官督商办势如虎”,反对清政府对民间资本的限制与干涉。郑观应指出:“凡通商口岸,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12](P612)}。在此基础上,郑观应进一步批判了“贱商轻商”的传统观念,响亮提出了“商战”的口号。郑观应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两种方式,即“兵战”和“商战”。兵战易于觉察,好对付,商战“蔽国无形”,则是潜在的经济侵略,不易发觉,尤其危害性。他的结论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2](P386)}。在如何进行商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他建议清政府改变以往“崇本抑末”政策,成立商部,颁布商律,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利益;在“商战”的策略问题上,郑观应主张知己知彼,扬长避短地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处理“工”和“商”的关系上,郑观应强调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把“商战”建立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使之立于不败之地。他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商战”,振兴民族工商业经济,中国终将会“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天下”^{[12](P591)}。郑观应“商战”思想,不仅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要求设议院、行立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针对清朝内政专制、黑暗、腐败的状况,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出发,要求采用西方国家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政体,以代替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其中王韬是较早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议会制的人。他在1883年时说:西方有君

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以君民共主最为优越。因为它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因而其国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至,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风闻向慕,则以君民上下相联络之效也”^{[11](P23-24)}。这里所说的“民主”、“君民共主”就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政体。郑观应是早期维新派中对西方议会政体最留心研究,提倡最力的一个。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当人们都热衷于洋务、只注重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时,郑观应就已经“究心政治、实业之学”,正因为如此,他较早地对西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了“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最适合中国的结论,并把这个观点写进他1880年刊行的《易言》一书中。郑观应把议院制度看作国家的“富强之本”,他称赞议院是“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议,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12](P311)}1884年,他在南洋历时的日记中进一步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掎格,难臻富强。”^{[13](P67)}1892年,他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更明确地写道:“中国遗其体效其用”,必将步趋人后,永远不能迎头赶上,即使是“铁舰成行,铁路四达”,工业很发达了“果足恃欤”^{[14](P44)}。在这里,郑观应一再强调的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科学技术,以致富强,必须改变封建制度,实行新的合乎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度。

以上这些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要求和主张,正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清政府在当时能采用他们的建议和主张,即行变法,改弦更张,像日本一样变法维新,将会给中国带来一个难得发展的机遇,使中国摆脱以往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统治集团,根本不考虑早期维新派的思想要求和主张。却正在忙着修建工程浩大的颐和园,只考虑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专制集权,尽情挥霍,仅营建颐和园就耗费白银5000多万两,甚至为修园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使海军停止添购添舰,种下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丧师的祸根。直到甲午战败以后,列强瓜分狂潮掀起,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亡国灭种即在目前的情况下,1898年,清政府才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再呐喊和呼吁下,由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主持,宣布变法。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科技文化的主张和要求,但一字没提

及维新派所梦寐以求的设议院、行立宪。即使是这些没有触及封建统治根本体制的变法,也为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集团所不能容忍。

戊戌变法不失为一次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社会转型的良好机遇,但却未抓住。戊戌变法失败后,时过境迁,事隔三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又宣布维新变法,称之为“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几乎与戊戌变法无异。“新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没有挽救清朝的灭亡。

总的说来,社会上思想界先觉们的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晚清政府无视思想界先觉们的思想主张和要求,政治决策一再滞后于社会很多年,使中国一再失去良好的发展机遇,这说明晚清政府始终落后于时代,不能与时俱进,严重桎梏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一个腐朽、落后、顽固、反动的政府,它的最后灭亡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 [1] 龚书铎. 中国近代文化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 龚自珍. 己丙之际箴议第九[A]. 龚自珍全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3] 龚自珍. 乞余保阳[A]. 龚自珍全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4] 魏源. 默觚下·治篇五[A]. 魏源集: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5]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 第6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6] 魏源. 筹海篇·议战[A]. 海国图志[M]. 光绪十三年善成堂刻本.
- [7] 苑书义, 胡思庸. 中国近代史新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 [8] 管同. 禁用洋货议[A]. 因寄轩初集: 第2卷[M]. 光绪己卯刻本.
- [9]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第1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10] 马建忠. 拟设翻译院议[A]. 适可斋记言: 卷4[M]. 光绪年间刻本.
- [11] 王韬. 园文录外编[M].
- [12] 郑观应. 盛世危言·商务二[A]. 郑观应集: 上册[M].
- [13] 郑观应. 南游日记[M]. 原稿影印本.
- [14] 郑观应. 盛世危言·自序[M].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第1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